



## 以「現代」為名：錢基博及其《現代中國文學史》

王文仁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 摘要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是中國第一本以「現代」為名的文學史著，其內容卻是十足的中國古文學。錢氏承襲傳統《文苑傳》與「文史」的觀念，以文言寫出大談古典文學的「現代文學史」。其結尾雖然寫到五四，但論述主幹仍在近代文學。其尊傳統而批判新文學的論述，顯現了對當時國學沒落的憂心，希望透過文學史的撰寫重新確立儒家道德倫理、捍衛國學。而其價值乃在保留、論述了較少為人所觸及的近代文學裡，傳統但仍具研究意義的部分。

**關鍵詞：**錢基博、中國現代文學史、古文學、新文學、國學。



**Named as "modern" :**  
**Qian, Ji-Bo and his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Wen -Jen Wang

**Abstract**

Qian, Ji-Bo's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s the first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with the word "modern." However, its content is 80 percent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Following the traditional conception from "*Wen Yuan Chuan*" and 'Wen Shi' (文史, which means history of literature), Qian wrot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which addresses classical literature, in classical Chinese words. The book ended in discussing "May Fourth," but its major points mainly lie in the discussion of early modern literature. Qian criticizes new modern literature because he worries about downfallen Sinology. He tries to reconfirm Confucianism and defend Sinology by writing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 main value of this book was to preserve and discuss traditional but meaningful parts of the early modern literature which few people know about.

**Keywords:** Qian Ji-Bo,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new modern literature, Sinology.



## 一、前言

以「文學史」的名義對中國文學的源流、變遷加以描述，在中國始於二十世紀初。一如陳平原所指出，晚清之所以提倡「新教育」，最早並未將文學的革新視為主要訴求；相反地，「新教育」之所以必要，正是要改變中國人過去「重虛文」而「輕實學」的壞毛病。<sup>1</sup>1903年，晚清最重視教育的大臣張之洞（1837-1909）奉旨參與重訂學堂章程，首次將「中國文學」一科納入〈奏定大學堂章程〉，並在「歷代文章流別」底下提及「日本有《中國文學史》，可仿其意自行編纂講授」。<sup>2</sup>隔年，年輕的林傳甲（1877-1922）受聘為京師大學堂國文教習，匆忙間完成《中國文學史》（1904）這一開山之作，開啟了文學史教育在中國百餘年的歷程。因應於現代民族國家想像的需要、百年中國知識體系的變化以及新教育體制的要求，<sup>3</sup>由西方傳來的「文學史」概念，開始改變傳統士人過往對於「文學」的認識，並轉換視角、方法與語言來講述中國文學的過往歷史。受到當時文明與進化思潮的廣泛影響，文學進化史觀也不無主導了早期中國文學史的寫作。<sup>4</sup>

1920年代後，中國文學史的研究與著述進入第一個高峰。這股文學史寫作風潮的形成，主要來自於兩個方面的影響：一是，教學上講述的需要。作為一種新的知識體系，文學史的誕生與發展從來就與新式教育（尤其是大學學堂）脫離不了干係。從林傳甲開始，為因應於新式教育學堂中的文學史課，在沒有合適教材的情況下，教師們不得不自製講義。這些講義接續出版後，就成了一冊冊以課堂

---

<sup>1</sup> 陳平原：《作為學科的文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頁3。

<sup>2</sup> 北京大學校史研究室編：《北京大學史料·第1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頁108。

<sup>3</sup> 陳平原：〈「文學史」作為一門學科的建立〉，《文學史的形成與建構》，（廣西：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頁3-6。

<sup>4</sup> 相關討論參見王文仁：《啟蒙與迷魅：近現代視野下的中國文學進化史觀》，（臺北：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1）。



為綱的文學史作。二是，作為一門西方而來的新穎學科，文學史能在有限的篇幅中，幫助讀者從歷時性與整體性的角度來掌握中國文學的發展，所以在課堂外也很受一般讀者們的喜愛。在這樣的情況下，文學史的書寫浪潮先是在古文學的領域中迅速開花結果，繼而延燒到彼時新生的新文學領域。<sup>5</sup>

中國新文學史的研究萌芽於 1920 年代，在 1930 年代開始有了較繁盛的發展，這與新文學在 1930 年代逐漸站穩其根基，教育體制相互配合，無疑有著絕對的關係。彼時，各種文學社團、文藝流派開始大量活躍，文學評論也比 1920 年代有了較大的進展，擺脫了讀後感個別作家評論、微觀的文學批評的狀態，開始進入宏觀的新文學歷史進程的總結及回顧，這些都為新文學史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sup>6</sup>這股書寫文學史的熱潮，很快的就延燒到當時僅有十年發展歷程的新文學上，並在 1930 年代前期與中期，產出朱自清《中國新文學史綱要》（1929）<sup>7</sup>、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1932）<sup>8</sup>、王哲甫《中國新文學運動史》（1933）<sup>9</sup>、王豐園《中國新文學運動述評》（1935）<sup>10</sup>等最早一批書寫新文學的文學史作。

與上述的一批新文學史作相比，以「現代」為名的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無疑是個特殊的例子。就學術史的意義上來說，這是中國第一本以「現代」為名的文學史著；<sup>11</sup>然則究其實質，它卻是一本十足的中國古文學史。在這本以「現

---

<sup>5</sup> 參見王文仁：〈中國新文學史的開路者：朱自清及其《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東吳中文學報》第 21 期，2011 年 5 月，頁 320-321。

<sup>6</sup> 許懷中：《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史論》，（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7），頁 33-34。

<sup>7</sup> 朱氏 1929-1933 年在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開設上述課堂時所留下的成果，生前未能出版。

<sup>8</sup> 1932 年北京人文書店出版。

<sup>9</sup> 本書是作者 1932 年在山西省立教育學院講授新文學一課時編寫的，1933 年 9 月北平杰成印書局印刷、景山書店發行。

<sup>10</sup> 1935 年 9 月由新新文學社出版。

<sup>11</sup> 稍前，梁實秋曾發表〈現代中國文學之浪漫的趨勢〉（《晨報副刊》，1926 年 2 月 15 日）一文，以「現代中國文學」來指稱「新文學」。這是目前可以看到新文學研究的論著中，第一次明確



代」為名的文學史中，錢基博採取傳統紀傳體以人為中心的體例。在抱定「搜討舊獻，旁羅新聞」的心態下，他的文學史書寫承襲了中國傳統《文苑傳》與「文史」的觀念，在一片求新的呼聲中，以文言寫出大談古典文學的「現代文學史」。錢氏何以在新文學已發展十餘年後，寫出這樣的「現代文學史」？他的文學史如何與時人文學與文學史論的看法相詰辯？此等，在文學史發展已有百年的今天，猶仍值得我們的思考與追尋。

## 二、「文學」與「文學史」的定義

錢基博（1887-1957），字子泉，自號潛廬，又號老泉，江蘇無錫人，錢鐘書（1910-1998）之父，民初以來相當具代表性的國學研究大師。年幼時受傳統國學影響飽讀五經文史，年長後受「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潮啟發接受西方現代化科學教育的薰陶，而有了理解與接受新學的能力。辛亥革命後，曾短暫任無錫縣第一小學文史地教員，繼之先後執教於聖約翰大學、清華大學、光華大學、無錫國學專門學校、浙江大學、湖南藍田國立師範學院、華中大學等學校。錢基博文史功力深厚，在文學和文學史、經史諸子和文獻學等領域均有深入而可觀的研究。他在文學史的寫作上，有《現代中國文學史》與《中國文學史》兩本專著。<sup>12</sup>其中，前書或者可以視為後書的一個重要前哨站；也就是說，錢基博其實是透過

---

且自覺地將「新文學」與「現代中國文學」劃上等號。儘管其稱呼與我們現在慣用的「中國現代文學」有所不同，對新文學多所批評，亦非嚴格意義上的文學史著，其意義卻很值得我們的重視。

<sup>12</sup> 前書寫就於1917-1932年間，後書後完成於1939至1942年間。《中國文學史》的主體是錢氏在國立師範學院任教時編著的《中國文學史》教材，包括《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文學史》、《唐代文學史》、《宋金文學史》、《元代文學史》，1939年春至1942年秋寫成。《清代文學史》的部分陸續撰述，存錄於《論學日記》內，但未及成書錢氏就去世了。《論學日記》在1966年的浩劫中被付之一炬。1993年中華書局版《中國文學史》，清代部分只好代之以氏著《清人文集敘錄》。



《現代中國文學史》的書寫，作為寫作整體中國文學史前的重要準備。

《現代中國文學史》一書相關資料的蒐集，根據作者的證言，最早始於文學革命發生的 1917 年。<sup>13</sup>1923 年，錢基博初登大學教堂，在上海聖約翰大學擔任國文教授。匆促間，他銜命開設中國文學史課程，講授的內容是「近三十年來文學的演變」。在這堂課的開場白上，他是這樣說的：

本系系務會議，議決我開文學史一課，提起諸位興趣；我不想講古代文學，惹諸位的厭；我想講近三十年文學演變以到胡適，其人皆現在；而姓名，皆諸位在報上看到，必能發生興趣；然而舊演變，形形色色；中國四千年文學之演變，亦可縮影到此二三十人身上，作一反映！<sup>14</sup>

在這段陳述中，錢基博表明了其文學史教授的重心擺放在近三十年來文學之演變的兩個主要考量：一是，將文學研究的眼光聚焦於當下，透過當時剛發生不久的文學諸現象的演變講述，來提升學生學習「文學史」這種新興體裁的興趣；二是，將這樣的歷史講述，當成是中國四千多年文學發展的一個重要縮影，由今論古、以小喻大。正是在這樣一種管窺以通透中國四千年文學的假設底下，錢基博開始了這本文學史的寫作。<sup>15</sup>之後，他陸續任教於光華大學（1926-1936）、無錫國專（1927-1936），開設相關課程、撰寫此一文學史著。最後，在 1930 年左右完成這本三十餘萬字的專著。1932 年，無錫國專學生以《現代中國文學史長編》為名，集資鉛字印刷兩百本。1933 年 9 月，世界書局正式出版，改名為《現代中國文學史》，書末收有錢基博 1932 年 12 月 15 日寫於上海光華大學的〈跋〉。此後，1934 與 35 兩年連續再版（二、三版）。1936 年 9 月，該書發行增訂版（四版），

<sup>13</sup> 錢基博著、傅道彬點校：《現代中國文學史·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頁 448。

<sup>14</sup> 錢基博：〈自我檢討書（1952）〉，《天涯》2003 年第 1 期，頁 70。

<sup>15</sup> 伍大福：《錢基博文史教育述論》，《江南大學學報》，第 6 卷第 2 期，2007 年 4 月，頁 110。





字數增加至四十餘萬字，書末收有錢基博 1936 年 7 月 11 日寫於上海光華大學的〈四版增訂識語〉，這也成為此書最終的定稿。<sup>16</sup>

根據學者陳平原的研究，晚清民初古已有之的「文章流別論」之所以會轉化為今日流行於學界的「文學史」，其中最關鍵性的環節就是教育體制的嬗變。<sup>17</sup>新式教育的需求，使得教師必須在課堂上以史的方式，鋪展講述過往中國文學發展的歷史脈絡與時代契機。身為新式教育的傳播者，這些教師在講授相應的課程時，一方面必須揣摩新興的「文學」(Literature)與「文學史」(Literary History)觀念，將共時性與歷時性的研究參照擺進自己的課堂中；一方面又得照顧講授的需求，讓文學史講義具備綱舉目張、深入淺出的功效。另外，在文學史初生於中國的最初十餘年間，人們對於如何書寫文學史都還處於摸索與試探的階段，因此在講述中國文學史前先行討論「文學」的定義，是早期文學史作的一大特色，錢氏的《現代中國文學史》在這一點上亦不能例外。從字面上來看，「文學」一詞古來有之，雖然它的內涵與外延早已游移不定，有時指學術、文章，有時又指稱職官與學人，<sup>18</sup>但若將其在傳統中國文學的語境中，倒也還不難加以理解。但是，在西洋的「Literature」概念被引進後，人們開始意識到，但在西風東漸的影響下，「文學」的意義已開始向西方靠攏或偏移。在這種中國與西方、傳統與現代的劇烈拉扯下，身處其中的士人與知識份子無不得調整自己的座標，或型塑出一套能與之對抗的

---

<sup>16</sup> 1965 年，香港龍門書店重印了 1936 年的增訂版。1986 年，湖南岳麓書社改版印行，由華中師範大學中文系石聲準教授進行校訂。1996 年，河北教育出版社收入「現代學術經典」叢書。2004 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據 1936 年增訂版，由首都師範大學特聘教授傅道彬進行點校。本文所引《現代中國文學史》版本，為 2004 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所出版。

<sup>17</sup> 陳平原：〈「文學史」作為一門學科的建立〉，《文學史的形成與建構》，(廣西：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頁 3-6。

<sup>18</sup> 有關「文學」一詞在中國古代意義的演變，參見王夢鷗：《文學概論》，(臺北：藝文印書館，1991)，頁 1-7。



新論述。<sup>19</sup>

錢氏在本書的〈緒論〉中，開宗明義即對「文學」、「文學史」做了意義上的釐清。他認為「治文學史，不可不知何謂文學，而欲知何謂文學，不可不先知何謂文。」<sup>20</sup>針對「文」，錢氏共歸納出「複雜」、「組織」與「美麗」三個特質。<sup>21</sup>「複雜」指的是必須言之有物，也就是要有內容；「組織」指需言之有序，即重視文章書寫的架構；「美麗」則為適娛悅者，也就是必須讓讀者具有閱讀上的歡愉和趣味。由此，錢基博所推導出的「文學」具有廣狹二義。狹義的文學為「美的文學」，「論形式則音韻鏗鏘而或出於整比，可以被弦誦，可以動欣賞。」<sup>22</sup>錢氏認為這樣的「文學」定義專指「韻文」，用以解釋中國文學過於狹隘，因此他要採取的是廣義的定義方式：

然則「文學」者，述作之總稱，用以會通眾心，互納群想，而表諸文章，兼發智情；其中有偏於發智者，如論辯、序跋、傳記等是也。有偏於抒情者，如詩歌、戲曲、小說等是也。大抵知在啟悟，情主感興。<sup>23</sup>

錢基博所認知的「文學」，相當強調「知在啟悟，情主感興」，這樣的定義無疑在向中國的傳統靠攏。論辯、序跋、傳記既是中國古代之文，詩歌、戲曲、小說等文體也未脫傳統文學的範疇。同時，這樣的文學觀也蘊含了中國傳統「文以

---

<sup>19</sup> 像是顧實他在寫作《中國文學史大綱》時，就強調我國所謂「文學」一詞，具有幾個不同的意義：學問之義、詩書之義、學者之義、官吏之義；而英語的 *Literature*，實際上也指學問學識、書籍文庫以及文學詩文。謝無量在他知名的《中國大文學史》裡，也在討論文學的定義時，先列舉「中國古來文學之定義」，然後再討論「外國學者論文學之定義」。參見顧實：《中國文學史大綱》，（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6），頁 1-2；謝無量：《中國大文學史》，（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6），頁 1-8。

<sup>20</sup> 錢基博著、傅道彬點校：《現代中國文學史》，頁 III。

<sup>21</sup> 錢基博著、傅道彬點校：《現代中國文學史》，頁 III。

<sup>22</sup> 錢基博著、傅道彬點校：《現代中國文學史》，頁 III。

<sup>23</sup> 錢基博著、傅道彬點校：《現代中國文學史》，頁 V。





載道」的經世致用思想。這一點也是錢氏一直認為自己是在作「實用之學」，而非「扎進故紙堆」的一個很大的原因。<sup>24</sup>此種對「文學」的基本假設，也就導引了其文學史書寫的結構與走向。

當時諸多文學史家在探討文學史觀念時，大多會回到中國傳統找尋可資憑藉的根基。錢氏在談論「文學史」時，也回到中國傳統的「文史」觀念，以及《文苑傳》、《文章志》、《文章流別論》等處找尋立基之處。所謂「文史」，指的是藏身各種文學選本與評論集中的詩話、詞話、文話、曲話以及小說評點。<sup>25</sup>它並非獨立的類目，也沒有自成體系，而是隸屬於《藝文志》中。然而或許是這樣的名稱與「文學史」有些類同，當時的一些文學史家像是謝無量在寫作《中國大文學史》時就提到：「宋《中興書目》曰：文史者，譏評文人之得失也。故其體與今之文學史相似。」<sup>26</sup>錢基博不否認這兩者具有一定的關連，但也指出「文史」重視的是文學作品的羈評，而非文學作業的記載，有史之名而無史之實。<sup>27</sup>至於《文苑傳》的創設，始於范曄《後漢書》，其設立原在收羅因缺乏官方地位而未能進入列傳的文學史家。在錢基博看來，收入《文苑傳》的文學家皆屬第二流以下，且其作傳之旨在於簡略地鋪敘文學家的履歷，自然難以達成「綜貫百家，博通古今文學之嬗變，洞流索源」<sup>28</sup>的功效。至於《文章志》與《文章流別論》，前者以人為綱，後者以文體為綱，都是總集的體例而與史有別，只能與「文史」、《文苑傳》等權

<sup>24</sup> 胡悅哈：〈試論錢基博民主主義思想—以《現代中國文學史》為例〉，《湖南工業大學學報》第15卷第4期，2010年8月，頁78。

<sup>25</sup> 「文史」之名始於唐代，《新唐書·藝文志》下載錄有李充《翰林論》、劉勰《文心雕龍》、顏竣《詩例錄》和鍾嶸《詩品》等。所謂「文史」，概指那些專門針對文章、文人進行評論的詩詞文話等作。

<sup>26</sup> 謝無量：《中國大文學史》，頁41-42。

<sup>27</sup> 錢基博著、傅道彬點校：《現代中國文學史》，頁VI。

<sup>28</sup> 錢基博著、傅道彬點校：《現代中國文學史》，頁VI。



充文學史編纂的材料。<sup>29</sup>

錢基博提出上述三者，除了要區別它們與「文學史」的歧異，也在從中國傳統學術的知識體系，說明它們與新興的「文學史」體裁間的關係。錢氏以為，這樣的關係實際上是密不可分的：

夫文學史之事，采諸諸史之《文苑》；文學史之文，約取諸家之文集；而義則或於文史之屬有取焉。然設以人體為喻：事譬則史之軀殼耳，必敷以文而後史有神彩焉，樹之以義而後史有靈魂焉。<sup>30</sup>

這段文字中的「事」，指的是文學家們的生平及活動事蹟；「文」指的是文學作品；「義」則是評論家們對文學整體或個別作品的品評。「事」、「文」、「義」三者合一的「三要」—即作家生平事蹟、作品與對相應的評論—構成錢氏「事物浩博，文求滂沛，義不拘虛的治史風格」。<sup>31</sup>這樣的文學史書寫架構，實際上是吸取了《藝文志》以知識為中心的傾向，並融以《文苑傳》系統性、歷史化的寫作方法，採取「以文體為綱，以作家為目」的書寫方式來構設文學史。<sup>32</sup>透過這樣的型態，他希望達成的是：「見歷代文學之動，而通其變，觀其會通者也。」<sup>33</sup>錢基博「通其變，觀其會通」的想法，相當受到中國傳統《周易》所建構的歷史觀念的啟發。在這樣的理念視野下，他實際上是用動態演變而非裂割的觀點，來看待中國古文學和新文學間的關係。他寫作此書，既在以小觀大地闡發中國四千年文學之演變，也在勾勒彼時文章升降之得失，透過窮其源、竟其流以矯時弊。

<sup>29</sup> 錢基博著、傅道彬點校：《現代中國文學史》，頁VII。

<sup>30</sup> 錢基博著、傅道彬點校：《現代中國文學史》，頁VII。

<sup>31</sup> 周遠斌：〈錢基博的文學史建構理論及其實踐〉，《文學評論》2008年第3期，頁153。

<sup>32</sup> 王煒：〈從「文苑傳」到「文學史」—錢基博與近現代「文學」學科的生成〉，《江漢論壇》，2011年第3期，頁124。

<sup>33</sup> 錢基博著、傅道彬點校：《現代中國文學史》，頁VII。



### 三、客觀史學意識與「現代中國文學史」之寫作

就《現代中國文學史》一書寫作的動機來看，撇開作者課堂上教學的實際需要，很大的成分是錢基博為了對轉型中的史學，與民國以來劇烈的文學變遷，表達他獨特的看法。歷史意識的革新與民族意識的勃張，是 19 世紀以來「文學史」誕生最重要的背後之因。作為近代文學、科學和思想的產物，「文學史」的重要基礎是十九世紀以來的「民族—國家觀念」。文學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民族精神的反映。在當時，文學史經常被視為是藉由科學的手段，以回溯的方式，對民族精神所進行的描繪與塑造。從學科史的角度來看，文學與歷史之所以能夠在二十世紀初藉助中國文學史的形式完成它們對話溝通的可能，除了西學東漸的浪潮外，這兩個學科在自身轉變的過程中也產生了一些使其相互接近的因素。<sup>34</sup>史學與文學自經學中的解放以及科學化的研究，無疑是箇中要因。尤以，在梁啟超高舉「史界革命」的口號，透過科學史學瓦解了過去以政治為核心的史學傳統後，能夠展現社會進步的文明史與民族史的觀念大行其道。這種新的歷史意識，藉由報刊雜誌與歷史讀本的傳播，在二十世紀初興起了一股研究歷史的熱潮。<sup>35</sup>初生的中國文學史研究，被包裹在濃厚的歷史研究的氛圍裡，自然也離脫不了史學界普遍的話語與思維邏輯。考察《現代中國文學史·緒論》中的論述，我們可以發現，錢基博在談論文學史的書寫時，特別強調史學為客觀之學，主張文學史的書寫必須具有「科學」的性質。

《說文·史部》中云：「史，記事者也，從又持中。中，正也。」標舉史的書寫必須客觀公正。國學大師章炳麟（1869-1936）亦云：「記事之書，惟為客觀之

<sup>34</sup> 相關研究參見戴燕：《文學史的權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頁 47。

<sup>35</sup> 王文仁：〈「進化思想」與梁啟超的史界革命〉，《東吳中文學報》第 19 期，2010 年 5 月，頁 309-328。



學。」錢基博在〈緒論〉中引述這二者，並帶出如下的這樣的一段論述：

夫史以傳信。所貴於史者，貴能為忠實之客觀的記載，而非貴其有豐厚之主觀的情緒也，夫然後不偏不黨而能持以中正。推而論之，文學史非文學。何也？蓋文學者，文學也。文學史者，科學也。文學之職志，在抒情達意。而文學史之職志，則在紀實傳信。<sup>36</sup>

錢基博在這裡特別點出「文學」與「文學史」的不同，主要在於前者的功能乃是抒寫情志，後者的職責則在於紀述跟論證。文學史的名稱雖有文學，可根本上還是歷史，歷史的寫作當然必須具有相對客觀性的史學要求。也因此，他才會有如下的論斷：

文學史之異於文學者，文學史乃紀述之事，論證之事，而非描寫創作之事；以文學為記載之對象，如動物學家之記載動物，植物學家之記載植物，理化學家之記載理化自然現象，訴諸智力而為客觀之學，科學之範疇也。不如文學抒寫情志之動於主觀也。<sup>37</sup>

錢氏此一「客觀之學」的史學論斷，同樣見於後來的《中國文學史》一書；<sup>38</sup>而從這樣的敘述中我們也可以發現，錢基博對文學史的理解除了根基於中國傳統史學的觀念，也不無受到當時所流行的實證主義史學的影響。

1920 年代初期，是實證主義與歷史主義史學在中國發揮其影響力的年代。西方近代的實證主義思潮，最早是作為一種科學方法論而被介紹到中國。清末之際，嚴復（1854-1921）是系統地介紹西方實證主義的一人。當時，他把這種方法稱為

<sup>36</sup> 錢基博著、傅道彬點校：《現代中國文學史》，頁 V。

<sup>37</sup> 錢基博著、傅道彬點校：《現代中國文學史》，頁 V-VI。

<sup>38</sup> 錢基博：《中國文學史》，（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 5。



「實測內籀之學」。<sup>39</sup>在這之後，王國維（1877-1927）從實證主義的立場來建設新史學，將史學視為是追求「事物道理之所以存在之由與變遷之故」<sup>40</sup>的學問。在此同時，梁啟超（1873-1929）也從實證的角度來建設新史學的理論。到了 1920 年代，隨著新文化運動中科學浪潮的高漲，實證主義作為一種科學的方法受到了高度的重視。人們普遍相信，「近代科學之新生，無一非受方法之賜」，「科學之可貴，不在其出品，而在其方法也。」<sup>41</sup>身居於此一新史學研究的熱潮，錢氏也不無例外的向此靠攏。

為了論證客觀性的重要性，錢氏舉《史記》與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sup>42</sup>為例，指出前者「工於抒慨而疏於記事，其文則史，其情則騷也」，後者「褒彈古今，好為議論，大致主於揚白話而貶文言；成見太深而記載欠翔實也。」<sup>43</sup>他批判太史公的《史記》嚴格說來並不能算是史，因為其乃發憤之所作，過度抒發自我的情志而少記事。至於胡適 1922 年為《申報》創刊五十週年所寫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在他眼中因為過於褒揚白話而貶抑文言，成見太深、記載欠缺翔實，所以也不算是文學史。由此，錢基博申言「夫紀實者，史之所為貴；而成見者，史之所大忌也。」文學史必須客觀、科學地紀錄吾人的文學作業（活動）。<sup>44</sup>

錢基博這樣的看法，強調了文學史實的忠實記載及其客觀性，卻未能區別文學藝術與自然科學的客觀性。作為社會科學與史學之一環的文學史，並無法排除

<sup>39</sup> 所謂「實測」，就是以事實觀察和實驗作為一切知識的出發點和評價標準。所謂「內籀」，就是用歸納的方法以求得因果聯繫。

<sup>40</sup> 王國維：〈《國學叢刊》序〉，《觀堂別集·卷4》（上海：上海書店，1992），頁7。

<sup>41</sup> 繆風林：〈論歷史法〉，《時事新報·學燈》，1921年1月28日。

<sup>42</sup> 錢基博著、傅道彬點校：《現代中國文學史》，頁VI。錢基博原文「〈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應為「〈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之誤。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收入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集3》（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sup>43</sup> 錢基博著、傅道彬點校：《現代中國文學史》，頁VI。

<sup>44</sup> 錢基博著、傅道彬點校：《現代中國文學史》，頁VI。



主體性的評價與建構。上段文字錢氏所舉植物學家之記載植物與理化學家之載錄自然現象，其自然科學的載錄方式畢竟與文學史的書寫大相逕庭。文學史的建構與文學批評、文學理論密切相關，而這兩者皆不可避免地受到時代背景、個人喜好以及理論視角的制約。這是科學史學本身的盲點，也是錢氏理解上所受的限制。在確立了上述的史學觀念後，錢基博在〈緒論〉中進一步說明其撰寫「現代中國文學史」的背景與緣由：

民國肇造，國體更新；而文學亦言革命，與之俱新。尚有老成人，湛深古學，亦既如荼如火，盡羅吾國三四千年變動不居之文學，以縮演諸民國之二十年間；而歐洲思潮又適以時澎湃東漸；入主出奴，聚訟盈庭，一哄之市，莫衷其是。權而為論，其弊有二：一曰執古，一曰驚外。<sup>45</sup>

錢氏開始著手草創《現代中國文學史》的 1917 年，正好是文學革命如火如荼發生的文化轉型期。根據余英時對近代中國文化危機的階段性劃分，1917 年文學革命和新思潮運動的興起，是中國知識人第一次公開地承認西方文化全面地優於中國文化，並且要以西方為模式來重新改造中國文化的一個時期。<sup>46</sup>到了此一階段，「中體」的結構性位置被徹底的動搖，從緩變到速變，從局部到全部，文化危機一步步的加深，一直到五四全盤反傳統而達到高潮。早期中國文學史的書寫即誕生於此一巨變中，且被賦予重要的時代變革的任務。<sup>47</sup>錢基博綜觀當時之大勢，發現知識份子們肆應於時代變革時，在文學上普遍有兩種反應：一是執古，一是驚外。驚外者，「衡政論學，必准諸歐；文學有作，勢亦從同」，<sup>48</sup>這群人（即胡

<sup>45</sup> 錢基博著、傅道彬點校：《現代中國文學史》，頁 VIII。

<sup>46</sup> 余英時：《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臺北：東大書局，1995），頁 189。

<sup>47</sup> 相關論述參見王文仁：《啟蒙與迷魅－近現代視野下的中國文學進化史觀》，（臺北：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1），頁 171-310。

<sup>48</sup> 錢基博著、傅道彬點校：《現代中國文學史》，頁 VIII。





適等人)的特色是強調文學語言的口語及平民化,批判章太炎、林紓等的文必典則,且以西洋文學只有詩歌、小說、戲劇,以此來論斷中國文學之優劣。對此,他認為「川谷異制,民生異俗,文學之作,根於民性;歐亞別俗,寧可強同?」<sup>49</sup>批判一味追隨歐化之人,是削足適履、李戴張冠的行為。不過,他也同時批判當時的一些茹古深者,「鄙戲曲為下里,徒示不廣,無當大雅…終於食古不化,博學無成而已。」<sup>50</sup>把傳統中國文學限縮在極小的範圍。<sup>51</sup>他認為,上述兩者皆不可取,必須能夠做到執古御今、順應為用,才能讓中國文學的歷史被深刻的認識且獲得發揚,而這也是他寫作此書的用心之處。

值得注意的是,錢基博在《現代中國文學史》中所稱的「現代」,指的是1911年到1930年的這段期間,也就是以辛亥革命為中國現代史的開端,並延續到他完成此書的1930年代。對於這樣的命名方式,錢基博有著自己一套獨特的想法:

吾書之所為題「現代」,詳於民國以來而略推迹往古者,此物此志也。然不題「民國」而曰「現代」,何也?曰:維我民國,肇造日淺,而一時所推文學家者,皆早嶄然露頭角於讓清之末年;甚者遺老自居,不願奉民國之正朔;寧可以民國概之?而別張一軍,翹然特起於民國紀元之後,獨章士昭之邏輯文學,胡適之白話文學耳。然則生今之世,言文學而必限於民國,斯亦塵矣。治國聞者,儻有取焉。<sup>52</sup>

錢基博在〈緒論〉中,雖然強調是「詳於民國以來而略推迹往古者」,但在具

<sup>49</sup> 錢基博著、傅道彬點校:《現代中國文學史》,頁IX。

<sup>50</sup> 錢基博著、傅道彬點校:《現代中國文學史》,頁IX。

<sup>51</sup> 錢基博自己在寫作《現代中國文學史》時,其實也犯了他自己所指稱的這種毛病,將「古文學」限縮於文、詩、詞、曲的範疇中。

<sup>52</sup> 錢基博著、傅道彬點校:《現代中國文學史》,頁IX。



體的實踐上，論述清末者卻遠遠多於民初；而其時間的斷代其實更接近同一時期完成的陳子展《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1929)與《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1930)裡頭，對「近代文學」所立下的界定：即從「戊戌維新運動」(1898)，到其講述「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的 1928 年。但是陳子展在該書中，是以傳統士人「認知結構」(cognitive structure) 的巨大調整，作為確認文學蛻變、思潮改易的關鍵契機，強調的是戊戌之後一系列以傳播西學、討論變革、倡導啟蒙為宗旨的思想文化運動紛紛湧現，所促成中國文學的轉型。<sup>53</sup>至於錢氏此處對「現代」的界定，著眼點卻非清末民初思想文化的劇烈轉型，也不是文藝領域上由西而來的移植與轉變，而是僅指其所經歷、目見的時景，且聚焦於清末早已嶄露頭角的古文學家。

為了說明撰寫此一時期文學史的史觀，錢基博在〈緒論〉後的〈編首〉對中國文學數千年的演變做了分期的論述，並希望找尋現代文學所在此一流變過程中所扮演的地位。在〈編首·總論〉裡，他援引焦循(1763-1820)「一代之所勝」與胡適「一時代有一代之文學」的觀念，指出「事異世變，文學隨之」，中國文學之發展可便宜分為四期：第一期，唐虞至戰國，名曰「上古」；第二期，兩京以迄南北朝，名曰「中古」；第三期唐以迄元，謂之「近古」；第四期明清兩朝以迄現代。在第四個時期，乃是「詞融古今，理通歐亞，集舊文學之大成而要其歸，蛻新文學之化機而開其先。」<sup>54</sup>

錢基博將中國文學的歷史分成四個時期的作法，在當時的中國文學史中相當常見。像是曾毅在《中國文學史》、<sup>55</sup>謝無量在《中國大文學史》中，都沿用了當時歷史的分法，將中國文學的發展分為「上古」(五帝至秦)、「中古」(漢至隋)、

<sup>53</sup> 王文仁：〈近代文學及其文學史敘述—試論陳子展的兩部文學史作〉，《嘉大中文學報》第 5 期，2011 年 3 月，頁 7-9。

<sup>54</sup> 錢基博著、傅道彬點校：《現代中國文學史》，頁 1-2。

<sup>55</sup> 曾毅：《中國文學史》，(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



「近古」(唐至明)、「近世」(清)四個時期。錢氏的分期與前面兩者最大的不同，是以「近代」代之以「近世」，並且將一般劃入「近古」的明代也劃入「近代」。此一調整的背後，其實是為了強調明清文學的重要性，並且將「現代」視為是「近代」的延續：

此乃近代文學之大略也。現代文學者，近代文學之所發酵也。近代文學者，又歷古文學之所積漸也。明歷古文學，始可與語近代；知近代文學，乃可與語現代。既窮其源，將竟其流，爰述歷古文家為編首。<sup>56</sup>

「窮其源，竟其流」所標榜的，正是中國傳統所強調的源流正變，也就是將後世的文學視為古代文學的延續與流變，這也無怪乎錢基博在談現代文學之前，得先勾勒歷代文學之大勢與文章之升降。另外，錢氏對文體代嬗觀念的理解，實際上與胡適文體進化的思維有著巨大的差異，而是比較接近清末焦循所提出「文體代變」的看法。身為清代的《易》學大師，焦循在《易餘齋錄》卷十五中以閎通的視野總結了前人的說法，提出文學「一代有一代之所勝」的觀點。<sup>57</sup>焦循在看待中國文學發展時，將「窮則變，變則通」的「通變」觀點與「新變」的想法溶置於一爐，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所勝」的觀念，對於每個朝代的代表性文體，也能從文學自身發展的角度來思索。焦循主張論述文學創作與發展時應該著眼於「一代之所勝」，同時也透過歷時性的考察，替過去的朝代建立文體的典範與譜系。錢氏對焦循系譜與發展性觀念的重視，表明其將現代文學視為是古文學精神與形式的演化與延續，而非根本性的推翻。這樣的立論假設，其實也就決定了這本《現代文學史》，必然是一本真正的「古文學史」。

<sup>56</sup> 錢基博著、傅道彬點校：《現代中國文學史》，頁 24。

<sup>57</sup> 詳見(清)焦循：《易餘齋錄》，(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頁 339-341。



#### 四、國學沒落與新文學的否定

錢氏的《現代中國文學史》以文言寫成，在體系上採取的是傳統中國紀傳體以人為中心的體例。全書分為「上編 古文學」與「下編 新文學」兩個部分，再按照不同文類下繫作家，談述他們所創造的作品，也廣泛涉及民國以來的學術文化和政治民俗。因為固守傳統的文學觀，此書在古文學裡頭僅論及文、詩、詞、曲，捨棄了被視為小道的小說、戲曲；在新文學的部分，則幾乎只有談文而略略及於新詩。書中談論的作家多達百人，自古文學家王闖運開始而終於新文學的徐志摩。在〈序〉中，錢基博清楚說明寫作此書的用意在於：

是編以網羅現代文學家，嘗顯聞民國紀元以後者。略仿《儒林》分經敘次之意，分為二派：曰古文學，曰新文學。每派之中，又昭其流別；如古文學之分為文、詩、詞、曲，新文學之分新民體、邏輯文、白話文。<sup>58</sup>

從整體篇幅的比例來看，這本書上篇談論古文學的部分佔超過五分之三，下篇論新文學則佔不到五分之二。但是，在下篇中嚴格說來不算是真正「新文學」的康有為、梁啟超的「新民體」，以及嚴復、章士釗的「邏輯文」，就佔去了五分之四的比例，剩下的「白話文學」就祇能佔去全書的二十分之一。儘管，錢基博在撰寫《現代中國文學史》時，距離文學革命的發生尚沒有多少時日，從胡適寫作〈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到陳子展完成《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時，也的確多把新文學當成是中國古代文學史、近代文學史著作的一條尾巴，<sup>59</sup>但都沒有出現過這樣比例的懸殊。另外，錢氏此作並不援引西方的文學分類法，而是依據傳統中國文學的型態，剖析了詩、詞、曲、文等不同文類作品的成就。這樣的寫作

<sup>58</sup> 錢基博著、傅道彬點校：《現代中國文學史》，頁 1。

<sup>59</sup> 黃修己：《中國新文學史編纂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頁 9。



模式與他本身的學術養成，以及任教於國學專校脫離不了關係，當然也蘊含著悲愴為史的史家精神。

錢氏寫作《現代中國文學史》的十多年，正是中國內外交戰的兵戎時期。1924年，被軍閥洗劫一空的錢氏一家被迫離開無錫，遷往上海居住，國破家毀中他深刻地體會到逐漸沒落的國學，實際上是貫穿古今的憂患之學，並發憤地以「國性之自覺」來研究國學、整理國故。在《國學文選類纂·總敘》中，他強調了國學維繫人心、振奮國民性的主導作用，希望喚醒國人對本國傳統文化自覺擔當的責任意識。<sup>60</sup>《現代中國文學史》的書寫，實際上是這樣一份憂患之心，完整與迫切的具體實踐。<sup>61</sup>錢基博在完成於1932年的〈跋〉中，對當時國學的沒落與文壇發展的弊端，表達了沈痛的哀嘆與呼籲：

於戲！舉一世之人徒見諸公者文采照映，傾動當時；而不知柴棘滿胸，中有難言之隱，捫心不得，抱慚何窮。讀者以此一帙為現代文人之懺悔錄可也。民不見德，唯亂是聞，觥觥諸公，高文動俗，徒快一時，果何為乎？……獨念東漢黨人，千古盛事。然鄭康成經師人師，模楷儒冠；而名字不在黨籍，談者高之。……前人悔之，後來不悛；波隨流轉，漫漫安竭；長寫不測，知其何故哉？<sup>62</sup>

上述這段文字，在批判守舊派與革新派而盼望執守中道之餘，更重要的是在新舊劇烈拉扯、變化的年代，意欲召喚逐漸消失的國性自覺。錢基博在《現代中國文學史》中，儘管對當時新文學的發展並非完全偏廢不論，但其主要目的卻是

<sup>60</sup> 曹毓英：《錢基博學術論著選》，（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頁21。

<sup>61</sup> 陳岸峰：〈發憤以抒情：論錢基博的《現代中國文學史》〉，《漢學研究》第22卷第1期，2004年6月，頁350-353；周遠斌：〈錢基博的文學史建構理論及其實踐〉，《文學評論》2008年第3期，頁157。

<sup>62</sup> 錢基博著、傅道彬點校：《現代中國文學史》，頁448-449。



在闡發即將消逝而珍貴的傳統文學。寫在「下編 新文學」開頭的一段文字，表明了錢氏在論述現代文學時，如何根源於傳統源流正變的想法，將現代文學中古文學的流別上繫中古與近古：

當代之文，理融歐亞，詞駁今古，几如五光十色，不可方物；而要其大別，曰古文學，曰今文學，二者而已。談古文學者，或遠溯中古以上，或近稱近古而還。王闓運、章炳麟、李詳、孫德謙、蘇玄瑛之文與詩，蓋遠溯中古以上者。其近稱近古而還者，文則有王樹枏、賀濤、馬其昶之為湘鄉，桃永樸、永概兄弟及林紓之為桐城派焉。詩則有易順鼎、樊增祥、楊圻之中晚唐，陳三立、鄭孝胥、陳衍之宋詩焉。詞則有朱祖謀、況周頤之為常州派焉。曲則有王國維、吳梅之治元劇焉。此古文學之流別也。<sup>63</sup>

按照這樣的描繪，民國以來的「古文學」發展實際上是精彩可期的，因為它上承數千年來發展之成果，又扮演集大成的薈萃之功；至於處於文學過渡時期的「新文學」，則被區分為康有為、梁啟超所倡的「新民體」，嚴復、章士釗推行的「邏輯文」以及胡適所倡的「白話文」三者。錢氏以為，三十年來國內政治、學術之巨變與文章之革新，皆始於康有為。<sup>64</sup>他從學術發展與文體創發的角度，肯定了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章士釗等人的貢獻；但是，這樣的稱讚背後，卻是將這四人的文學表現，通通聯繫上被視為是控制思想、陳腐虛偽的八股文：

然而康有為、梁啟超之視嚴復、章士釗，其文章有不同而同者；籀其體氣，要皆出于八股。八股之文，防于宋、元之經義，盛于明、清之科舉，朝廷以之取士者逾六百年。而其為之工者，無不嚴于立界（犯上連下，例所不

<sup>63</sup> 錢基博著、傅道彬點校：《現代中國文學史》，頁 297。

<sup>64</sup> 錢基博著、傅道彬點校：《現代中國文學史》，頁 368。





許)，巧于比類（截搭釣渡），化散為整，即同見異，通其層累曲折之致……；而數百年來，吾祖宗若宗德術心智之所資以砥礪而不終萎枯也歟？迄於清末，而八股之文隨科舉制以俱廢；而流風餘韻猶時時不絕流露于作者字裡行間。有襲八股排比之調，而肆之為縱橫軼宕者；康有為、梁啟超之新民主文學也。有用八股偶比之格，而出之文理密察者；嚴復、章士釗之邏輯文學也。<sup>65</sup>

如此一來，在「新文學」中倒有五分之四都成了八股文的遺緒；而不用說，胡適等人所提倡的文學革命與白話文學，就能被大力的批判了。不過，錢基博的《中國文學史》，也不是一開始就對文學革命者這麼的不友善。根據陳岸峰的研究，在 1933 年版的該書中，儘管錢基博對新文學運動著墨不多，但也還肯認胡適、陳獨秀仿照義大利所進行的文藝革命，其關鍵在於 1936 年四版增訂時，加進了對 1920 年代新舊文學論戰時的一些觀察，大力吸收了《學衡派》學者們的守舊想法，也就成了現在我們所看到的《現代中國文學史》中，對 1917 年後的新文學運動所進行的攻擊。<sup>66</sup>

在篇幅微小的「白話文」一小節裡，錢基博引述了胡適《嘗試集·自序》的文字，指出以此可窺見胡適文學革命的歷程，及其自號於天下的三個觀念：八不主義、歷史的文學進化觀念、文學的試驗精神。<sup>67</sup>事實上，胡適這三個觀念背後聯繫的是將白話文視為「活文學」、文言視為「死文學」的根本想法。這樣的想法創造了五四文學的新圖景，卻也導致古文學傳統的根本性破壞。<sup>68</sup>毀壞古文學，

<sup>65</sup> 錢基博著、傅道彬點校：《現代中國文學史》，頁 368。

<sup>66</sup> 相關探討參見陳岸峰：〈發憤以抒情：論錢基博的《現代中國文學史》〉，頁 333-344。

<sup>67</sup> 錢基博著、傅道彬點校：《現代中國文學史》，頁 427-444。

<sup>68</sup> 相關論述參見王文仁：〈胡適「歷史的文學觀念論」析論〉，《應華學報》第 3 期，2008 年 5 月，頁 111-137。



不僅僅是否定了文言文學的存在，更是割裂了文學與傳統的聯繫（當然還包括對八股文嚴厲的批判），這對堅守國學、重視文學傳承的錢基博來說，自然是無法容忍的。因此，在 1936 年增訂四版以後的《現代中國文學史》中，胡適被形容成沽名釣利、自相矛盾之輩。<sup>69</sup>可作為五四代表的魯迅、徐志摩等人的作品，要不被認為「頹廢」，要不就被當作是「沈溺小我已享樂」。<sup>70</sup>文學革命與白話文學的提倡，自然不是推動中國文學現代化的重要進程，而是將沒落的國學推向崩毀的元兇。也就是這樣，我們才會在本書的結尾看到，錢基博深痛的表示：「予故著其異議，窮其流變，而以俟五百年後之論定焉。」<sup>71</sup>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對新文學論述的偏頗之處，在 1930 年代即受到當代知識人，如戚施、穆士達、馬玉銘、王旬等人的批評。他們的批評主要都集中在：他對白話文的新文學，忽略與不切合現實的評價。<sup>72</sup>對照稍前同樣論及這段時期的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與陳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我們不難發現其中的落差：前者把古文學的成就提高到新文學的三倍，後者讓五四前的革新成為文學革命的先聲，賦予近代文學轉型的意義與地位。<sup>73</sup>胡適與陳子展文學史論述關注的重心，都是由傳統文學向現代文學轉變的歷史中，轉換的必然性與內在機制。他們以最後一節的形式來講現代文學，表面上與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的形式相近，其實質內涵卻是為了推崇文學革命運動的成果。錢基博的該著剛好相反，他在書中對白話文學的批判源於他國學家、古文家的身份，也反

<sup>69</sup> 錢基博著、傅道彬點校：《現代中國文學史》，頁 445。

<sup>70</sup> 錢基博著、傅道彬點校：《現代中國文學史》，頁 446。

<sup>71</sup> 錢基博著、傅道彬點校：《現代中國文學史》，頁 447。

<sup>72</sup> 相關討論參見涂耀威：〈文學史的權力－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閱讀〉，《中國文學研究》，2008 年第 1 期，頁 49。

<sup>73</sup> 參見王文仁：〈近代文學及其文學史敘述－試論陳子展的兩部文學史作〉，《嘉大中文學報》第 5 期，2011 年 3 月，頁 1-28。



映了當時對文學革命運動抱持反對的士人們，在過渡時期所抱持的普遍想法。

當然，錢基博的這本文學史著也非一無可取。時人穆士達認為，「專講現代中國文學史的，在過去竟沒有一本《簡編》之類的小書。所以錢先生的一部書，即使本身尚有缺陷，也算是為出版界彌補了一種缺陷。」<sup>74</sup>就是從學術史的角度，肯認了錢基博在現代中國文學史上的開創意義。董乃斌等在《中國文學史學史》中認為，它所採取資料長編的寫法，保留了以後的文學史敘述常常忽略的一些史料，因此其地位是相當重要的。<sup>75</sup>張筱南、程翔章在〈錢基博與中國近代文學〉中則是肯認，「錢基博在這一時候逆潮流而動，選擇以近代『舊文學』尤其是近代散文為中心，一方面是其深厚的國學修養使之對傳統散文藝術難以割捨；另一方面，也表現出一代宿儒不隨波逐流的學術品格。」<sup>76</sup>郭延禮則是認為：「《現代中國文學史》批評方式雖然舊一些，著者的評論也相對少些，但該書史料豐富，旁徵博引，重視知人論世，有些評論也很有見地，頗著『史識』。該書對於中國近代文學研究，特別是對舊派文學研究有一定的貢獻。」<sup>77</sup>

從上述學者們正面的評價來看，錢氏這本文學史著最大的價值，就在於保留且論述了長久以來一直較少為人所觸及的近代文學中，較為傳統但仍深具研究意義的古典文學的部分。錢基博在書中所描寫當時舊文學的代表人物，如以陳三立、鄭孝胥為首的晚清宋師派，或是以林紓為首的桐城派作家等，詞人朱祖謀、況周頤等人，在當時仍從事古典文學的創作且非常活躍，這些人物卻幾乎被遺忘在後來的現代文學史裡。至於開創一代革命先鋒的康有為、梁啟超、嚴復與章士釗等

<sup>74</sup> 穆士達：錢基博著《現代中國文學史》的批評，收入傅宏星編：《錢基博年譜》，（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頁108。

<sup>75</sup> 董乃斌、陳伯海、劉揚忠：《中國文學史學史·卷2》，（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頁275。

<sup>76</sup> 張筱南、程翔章：〈錢基博與中國近代文學〉，《文學教育》，2007年9月號，頁18。

<sup>77</sup> 郭延禮：《20世紀中國近代文學研究學術史》，（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頁64。



傳統士人，在書中也都獲得了其應有的評價。

## 五、結論

從上述相關的討論我們不難得知，錢氏的《現代中國文學史》作雖以「現代」名之，實際上卻是以新文學史這種嶄新的著述體裁，來反新文學的一種表現。其結尾雖然寫到五四之後，但論述主幹仍在近代文學，且是近代文學中較為傳統、保守的部分。這種尊傳統而批新文學的論述方式，顯現了錢基博希望透過獨特的「現代中國文學觀」，重新確立儒家道德倫理、捍衛國學，糾正民國初年新學之士帶來淺薄虛華學風的根本性想法。<sup>78</sup>他承認一代有一代之文學，不再一味替舊文學辯護，卻也不同意倡議新文學者全面西化的激進主張。他以紀傳體的方式撰寫文學史，以及對「文學」觀念選擇性的詮釋，顯現了其保守、傳統的一面；而他對「新文學」的劃分與闡述，則又融會新知地表明新、舊文學間艱難轉型的複雜樣態，這也是這部文學史著最為特殊之處。

從時代的變革來看，1917 年之後的新文學，可以說是在極短的時間中，便為自己找到確證其正當性與發聲權力的方式。這與五四一代學人的光芒迅速照亮文壇，以及現代文學進入大學校園進而成為國家敘述的樞紐，當然有著絕對的關係。1949 年後，中共國家神話的樹立，很自然的讓文學研究與文學論述的目光通通聚焦給了五四。<sup>79</sup>相對的，由晚清以迄民初的數十年文藝動盪，則被視為傳統逝去

<sup>78</sup> 相關討論參見胡悅哈：〈試論錢基博民主主義思想—以《現代中國文學史》為例〉，頁 78。

<sup>79</sup> 1950 年 5 月，中共中央教育部頒佈了〈高等學校文法兩學院各系課程草案〉，其中對中國新文學史課程的內容作了如下規定：「運用新觀點，新方法，講述自五四時代到現在的中國新文學的發展史，著重在各階段的文藝思想鬥爭及其發展狀況，以及散文、詩歌、戲劇、小說等著名作家和作品的評述。」當時的任務，就在於通過三十二年的文學史，說明五四之後的新文學，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換言之即中共國家神話的豎立。參見黃修己：《中國新文學史編纂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 126-130。



的尾聲或西學東漸的先兆，而少了學人們關注的眼光。<sup>80</sup>作為上承古代，下啟現代的過渡時期，近代文學在中國文學新舊變革與典範轉移的過程中，自然地具有了面對過去與朝向未來的雙重性。我們既不能像胡適等學人將文學革命的意義無限上綱，更具深度與廣度的探索也成了而今治文學史的學者深切考察的論域。從這樣的角度來看，填補其他現代與近代文學史中失落的一塊，正是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之所以仍具研究價值的重要之處。

## 參考書目

### 專書

〔清〕焦循：《易餘齋錄》，（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

王國維：《國學叢刊·序》，《觀堂別集·卷4》，（上海：上海書店，1992）。

余英時：《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臺北：東大書局，1995）。

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卷3》，（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曹毓英：《錢基博學術論著選》，（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郭延禮：《20世紀中國近代文學研究學術史》，（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

曾毅：《中國文學史》，（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

黃修己：《中國新文學史編纂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

<sup>80</sup> 王德威：〈沒有晚清，何來五四？—被壓抑的現代性〉，收入《如何現代，怎樣文學？》，（臺北：麥田出版社，1998），頁23-24。



董乃斌、陳伯海、劉揚忠：《中國文學史學史·卷 2》，（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

穆士達：〈錢基博著《現代中國文學史》的批評〉，收入傅宏星編：《錢基博年譜》，（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戴燕：《文學史的權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繆風林：〈論歷史法〉，《時事新報·學燈》，1921 年 1 月 28 日。

謝無量：《中國大文學史》，（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6）。

### 期刊論文

王文仁：〈「進化思想」與梁啟超的史界革命〉，《東吳中文學報》第 19 期，2010 年 5 月。

王文仁：〈中國新文學史的開路者：朱自清及其《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東吳中文學報》第 21 期，2011 年 5 月。

王文仁：〈近代文學及其文學史敘述—試論陳子展的兩部文學史作〉，《嘉大中文學報》第 5 期，2011 年 3 月。

王文仁：〈胡適「歷史的文學觀念論」析論〉，《應華學報》，第 3 期（2008 年 5 月）。

王煒：〈從「文苑傳」到「文學史」—錢基博與近現代「文學」學科的生成〉，《江漢論壇》，2011 年第 3 期。

周遠斌：〈錢基博的文學史建構理論及其實踐〉，《文學評論》2008 年第 3 期。





以「現代」為名：錢基博及其《現代中國文學史》

胡悅晗：〈試論錢基博民主主義思想—以《現代中國文學史》為例〉，《湖南工業大學學報》第 15 卷第 4 期（2010 年 8 月）。

涂耀威：〈文學史的權力—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閱讀〉，《中國文學研究》，2008 年第 1 期。

張筱南、程翔章：〈錢基博與中國近代文學〉，《文學教育》，2007 年 9 月號。

陳岸峰：〈發憤以抒情：論錢基博的《現代中國文學史》〉，《漢學研究》第 22 卷第 1 期（2004 年 6 月）。

